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 ——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

羅麗馨*

摘要

豐臣秀吉於 1592 年和 1597 年二次出兵朝鮮，諸將領中不少是教徒。這些將領的領地也是教徒眾多的地區，因此其軍隊中有入教士兵。日軍撤退至半島南海岸後，日、明雙方持續和談。由於歸國無期，士氣低落。篤信基督教的小西行長或許為鼓舞士氣，他向 Gomez 請求派遣傳教士至其軍中，因此西班牙傳教士 Cespedes 與日本人修士 Leon 同赴其駐守地熊川。Cespedes 在熊川及機張，為軍中信徒講道、聽告解，安慰他們的心靈。也為新入教者洗禮，提供醫療服務等，但停留時間很短。日軍第二次入侵朝鮮時，亦有神父與修士短暫至半島。由於害怕異教徒告發，且朝鮮居民風聞日軍接近即逃走。因此，這些傳教士活動的地區既受限制，亦難與當地朝鮮人接觸。

日軍侵略朝鮮期間，隨軍僧侶有禪僧、日蓮僧、真宗僧、修驗僧等。他們與大明、朝鮮交涉和談、起草榜文、施藥醫療、從事戰鬥、弘法等。由於交涉和談均由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主導，此兩軍軍中之僧侶因此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樑。隨軍僧侶在軍中之宗教活動記載甚少，但為戰死者祈冥福應是職責之一。

隨軍禪僧熟悉儒教，草擬之榜文即呈現儒家安民、恤民之統治理念。他們頌揚神功皇后征三韓，將兵端之起歸咎朝鮮。至於真宗僧，信仰熱忱、堅定，但著重現世利益。這些隨軍僧侶，無戰鬥時，多寄情詩賦，文人思維。

關鍵詞：豐臣秀吉、傳教士、僧侶、小西行長、加藤清正、萬曆朝鮮之役

2014 年 2 月 27 日收稿，2014 年 7 月 24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1 月 2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日軍於 1592 年 4 月出兵朝鮮，其後勢如破竹，約三個月幾乎佔領朝鮮半島。1593 年正月 6 日平壤之役，日軍戰敗後，各軍陸續撤至漢城。27 日碧蹄館之戰明軍失敗，雙方開始和談。4 月 18 日，日軍從漢城撤退，並集結至朝鮮半島南海岸。之後，部分軍隊回國，部分留駐當地營建要塞，鞏固據點。1596 年 8 月大坂和談破裂，1597 年正月再度出兵。1598 年 8 月 18 日豐臣秀吉（1537-1598）病逝，11 月下旬開始撤軍，12 月 11 日日軍全部歸國。

豐臣秀吉用兵朝鮮期間，日軍與明軍、朝鮮軍均有交涉，尤其與明軍長期進行和談。這些事務由誰擔任？用何方式交涉？他們有何思維？對長時間在半島作戰、駐守、受傷、患病的士兵，如何撫慰、照顧他們？這些都是這場戰爭值得探討的問題。

日軍軍中因有將領及士兵是教徒，在厭戰氣氛中，曾短暫招請傳教士至軍中，安慰教徒心靈，提供醫療服務。又，入侵朝鮮各軍，亦有僧侶隨行。各將領即倚賴他們的漢學素養及對外交涉經驗等，從事各種相關活動。日軍軍中有傳教士與僧侶存在，分析兩者的活動，可以解決上述諸問題。

由於赴朝鮮半島的傳教士只有數封書信留存，隨軍僧侶僅少數留下隨軍日記，相關主題之研究亦少，因此本文僅就有限史料作論述。

二、日軍軍中的傳教士

基督教傳入日本是在 1549 年 8 月，當時西班牙傳教士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與同國籍的神父 Cosme Torres（1510-1570）、修士 Juan Fernandez（1526-1567），在日本青年彌次郎引導下，於鹿兒島上陸，並開始傳教。¹ 之後十年間，基督教主要在九州地區，如鹿兒島、平戶、府內、朽網、博多、度島、生月島、及山口等地傳播，教徒約六千人。1560 年代，擴

1 參見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上卷（東京：新生堂，1925），頁 33-50。

展至橫瀨浦、大村、島原、口之津、長崎、川尻、五島、天草島志歧、天草河內浦，及京都、堺、奈良、沢、飯盛、八尾、三箇、余野等畿內地區。至1569年，包括大名、知識階層等教徒，約一萬八千至二萬人。1570年代，又伸展至東海、北陸地區。此時期，河內、攝津、豐後，及肥前大村、有馬，因領主信教促使領內百姓亦大量入教，1579年教徒激增至十三萬人以上。1580年代前半，繼續在播磨、岡山、小豆島、下關、伊予、伊勢等地擴展教勢。1587年豐臣秀吉發布驅逐令前，教徒約二十萬人。1590年隨基督教大名蒲生氏鄉（1556-1595）移封奧州會津，教勢亦及於東北。1596年豐臣秀吉第二次頒布禁教令，傳教士大致撤退至九州。但出羽、奧羽、關東、信濃、對馬等地，仍有大名及百姓入教。²

九州是大名入教最多的地區，大名入教有利於拓展教勢。1563年肥前大名大村純忠（1533-1587）最早入教，長子喜前（1569-1616）1570年受洗，1581年領內教徒達五萬人。³大友義鎮（1530-1587）法號宗麟，1578年受洗，長子義統（1558-1610）1587年受洗。其於豐後領內保護傳教士，支持傳教。至1581年，領內有教徒一萬人。⁴大村純忠兄有馬義貞（1521-1577）與子晴信（1567-1612），分別於1576年和1580年受洗。1577年義貞歿時，領內教徒有二萬人。⁵天草本渡領主天草尚種、子種元（?-1589）均是教徒，1578年領內教徒在五千人以上。⁶1581年九州地區教徒約十三萬人，1592年約二十萬人。⁷

九州地區入教的大名，另有伊東佑兵（1559-1600）、毛利秀包（1567-

2 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6-9。

3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Michael Steichen）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東京：乾元社，1952），頁17。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上卷，頁294。外山幹夫，《大村純忠》（東京：靜山社，1981），頁29-33、95-99。

4 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上卷，頁294。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141-145。竹本弘文，《大友宗麟》（大分：大分県教育委員会，1995），頁153、159。

5 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上卷，頁154-156。

6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頁39-41。

7 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上卷，頁294。木村紀八郎，《小西行長伝》（東京：鳥影社，2005），頁216。

1601)、宇久純玄(1562-1594)、宗義智(1568-1615)等。伊東一族在 1580 年入教。毛利秀包是毛利輝元(1553-1625)的叔父,受黑田孝高(1546-1604)影響受洗。宇久純玄與父純堯均是教徒,純玄大約於 1592 年出兵朝鮮時改姓五島。宗義智爲小西行長(?-1600)女婿,約於 1591 年成爲教徒。⁸

小西行長原爲宇喜多直家(1529-1582)、秀家(1572-1655)父子的家臣,何時成爲豐臣秀吉的家臣不清楚,父母、兄弟、妻女幾乎全入教。1588 年 6 月入主宇土城時,隨行之高山圖書(?-1595)、右近(1552-1615)父子、結城彌平治(1544-?)、內藤忠俊(1550-1626)、伊知地文太夫、日比屋了荷、日比屋宗札長子等均是教徒。⁹小西行長父隆佐(?-1595)、兄如清爲秀吉的側近重臣。秀吉的側近中,入教者尚有黑田孝高、安威了佐、牧村政治(1545-1593)、毛利高政(1559-1628)、曲直瀬道三(1507-1594)、蒲生氏郷、織田信秀(?-1597)、筒井定次(1562-1615)、寺沢廣高(正成、1563-1633)、京極高知(1572-1622)、大谷吉繼(1559-1600)等。黑田孝高受高山右近影響,於 1585 年入教。弟利高(1554-1596)、直之(1564-1609),及長子長政(1568-1623)亦相繼受洗。¹⁰此外,紀伊國大名淺野幸長(1576-1613)與阿波國大名峰須賀家政(1558-1639)均在大坂受洗。¹¹前田玄以(1539-1602)、細川忠興(1563-1646)、宇喜多秀家(1572-1655)、毛利輝元(1553-1625)等雖不入教,但其家族、家臣則多有入教者。¹²

1592 年日軍第一次出兵朝鮮,第一軍除松蒲鎮信(1549-1614)外,小西行長、宗義智、有馬晴信、大村喜前、五島純玄、天草久種、大矢野種基、種量父子均是教徒。同屬第一軍,1594 年受小西行長之命赴北京議和的內藤如安(1550-1626)亦是教徒。¹³黑田長政、大友義統屬第三軍,伊東佑兵

8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頁 37-39、100、114。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 9。

9 木村紀八郎,《小西行長伝》,頁 14、19-20、60、82、86、179、180。

10 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頁 166-180。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頁 114。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 141。

11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頁 174、175。

12 同上註,頁 170-171、173-175。

13 同上註,頁 23-24。北野典夫,《天草キリシタン史》(福岡:葦書房,1993),頁 44、

屬第四軍，蜂須賀家政屬第五軍，毛利秀包屬第六軍。¹⁴ 曲直瀬道三是醫生，1592年9月因秀吉之命赴朝鮮爲毛利輝元、羽柴秀勝（1569-1592）治病。¹⁵ 大谷吉繼於1592年6月以五奉行之一至朝鮮督軍，蒲生氏鄉、筒井定次駐屯名護屋大本營，高山右近以前田利家（?-1599）家臣隨至名護屋陣營。¹⁶

1593年1月底碧蹄館之戰，明軍失敗後雙方和談。4月18日日軍開始撤退，並在朝鮮半島南海岸營建十八城據守。¹⁷ 日軍將士在半島作戰已逾一年，歸國無期，士氣低落。駐守熊川的小西行長或許爲鼓舞士氣，他向日本耶穌會教區管長 Pedro Gomez（1535-1600）請求派遣傳教士至其軍中。¹⁸ 兵士中有多少是教徒，史料缺乏無法知悉。第一軍有將士一萬八千七百人，¹⁹ 將領幾乎全是教徒，各將領之領地又是教徒衆多地區，因此可以推測第一軍應有不少入教士兵，此大約亦是小西行長認爲軍中需要傳教士的理由。

Gomez 選派的傳教士是當時駐在肥前有馬的 Gregorio Cespedes（1551-1611），Cespedes 曾於1586年至小西行長管理的小豆島傳教，兩人是舊識。²⁰ 1593年12月9日他與日本人修士 Fancan Leon（1538-1627）到達對馬，²¹ 受到宗義智妻瑪利亞及百名以上教徒歡迎。他爲二十名重要人物受洗，其中有四名是宗義智的重臣。在對馬滯留十八天後，12月27日由鰐浦出發，

49。

14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頁75-78。

15 同上註，頁95。

16 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頁169。ディエゴ・パチェコ（Diego Pacheco, SJ），《九州キリシタン史研究》（東京：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会，1977），頁80。

17 中野等，《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頁184-185。日下寛編，《豊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朝鮮都引取朱印狀〉，頁447-450。

18 山口正之，《朝鮮西教史》（東京：雄山閣，1967），頁3。

19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76。

20 松田毅一，《キリシタン研究》（大阪：創元社，1953），頁27-32。Cespedes 赴日傳教經過，參見山口正之，〈文祿役中朝鮮陣より発せし耶蘇會士セスペデスの書翰につきて〉，《史学雑誌》49.2(1938.2): 173-175。

21 Fancan Leon 真名不詳，原是僧侶，後成醫者，1580年進入修練院，之後在豐後傳教。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Ruiz de Medina），《遙かなる高麗——16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東京：近藤出版社，1988），頁42-43。

28 日到達熊川。當時小西行長至距離約六、七里的地方（大概是安骨浦），接待他的是日比屋了荷和家臣小西作右衛門。小西行長不在期間，大村喜前兄弟、栖本殿、天草久種、有馬晴信弟相繼拜訪他。他既未拜訪任何人，亦未傳道。三天後小西行長回熊川，立刻派人表示歡迎，第二天兩人會面懇談。小西行長表示，他與幕僚居所在山麓，很多駐守其他城的異教徒會來拜訪他，因此希望 Cespedes 至山頂與日比屋了荷同住。²²

熊川城在熊川縣邑東南約半里的南山上，標高 184.3 公尺，主郭在山頂。²³ 小西行長和他的幕僚及兵士駐紮山麓，其弟與七殿和日比屋了荷駐守山頂。另一弟主殿介（?-1598）與宗義智的陣營距此約一里，周圍有四國、薩摩、大友吉統等駐軍，黑田孝高、長政父子則駐紮機張。²⁴ Cespedes 居住山頂，教徒告解必須上山，有時他也下山聽告解。此城山坡陡峭險峻，回山上時相當辛苦，雖乘馬途中亦必須多次休息。據 Cespedes 的報告書，小西行長常與有馬晴信、大村喜前、天草久種及重臣一起拜訪他，且拜訪他的教徒愈來愈多。最先向他告解的是大村喜前兄弟，而他們的士兵也是最早向 Cespedes 告解的熱心教徒。宗義智在拜訪 Cespedes 後，則希望 Cespedes 派修士到他的陣營向他的家臣傳道，因此 Leon 去了三天。之後因其家臣要受洗，Cespedes 又親自到他的陣營二、三天。到達當晚，小西行長之甥及三十名位高的武士受洗，第二天又有十人受洗，Cespedes 也贈予他們念珠。宗義智因與家臣一起聽道，對教義有新的理解，他要求留下修士教他告解，並表示對馬已有六十名重要人物受洗，若有傳道士到對馬，島民全體改宗並不困難。因此 Cespedes 認為，必須派遣傳道士到對馬，有主的護佑對馬百姓一定會全成為

22 ルイス・フロイス（Luís Fróis）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朝鮮発信、グレゴリオ・デ・セスペデス師の書簡〉，頁 262-264。〈同じグレゴリオ・デ・セスペデス師の第二書簡〉，頁 266-267。

23 伴三千雄，〈南鮮に於ける慶長文祿の築城〉6，《歴史地理》37.5(1921.5): 353。高田徹，〈熊川倭城の縄張り〉，《倭城の研究》5(2002.3): 83。

24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朝鮮発信、グレゴリオ・デ・セスペデス師の書簡〉，頁 266。宗義智、有馬晴信等，駐紮熊川城の子城甘浦城及甘浦城西方。山口正之，〈日本耶蘇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青丘学叢》2(1930.11): 62。

教徒。²⁵

Cespedes 也到黑田孝高、黑田長政父子駐守的機張城，他在機張停留十五天，每天早晚兩次講道。長政聽道外，亦詢問教義問題，藉此豐富自己的宗教知識。²⁶ Cespedes 於朝鮮寄出的第二封信中提到，朝鮮的寒冷是日本無法相比的。他整天在半凍狀態，唯早上作彌撒時手才勉強能動。不過有主的庇佑，很健康。對於主給予的成果很滿足，所有的勞苦和寒冷樂於忍受。²⁷ 1597 年 2 月 26 日，他在有馬寄出的書信中，有「爲了聽 2000 人以上從軍教徒的告解，安慰他們的心靈，我遵從上長的命令被派遣。」²⁸ 之語。據此推測，小西行長與黑田長政軍中應有兩千以上的教徒。

駐守各城的教徒則零散至熊川向 Cespedes 告解，異教徒中亦有聽教理後受洗者，如小西行長軍中名「時枝」之宇佐八幡宮宮司，他在戰爭結束前回宇佐，在其引導下，妻兒、家族、族外等四十人相繼入教。²⁹ 此外，筑紫廣門（1556-1623）長子晴門及其屬下也在熊川城受洗。之後，廣門在晴門說服下亦入教。³⁰ Cespedes 或許也想在朝鮮傳教，但實際上不可能。因在日軍佔領各城前，朝鮮人民已逃亡山中。唯一的傳道機會是以當時被俘擄在營的朝鮮人爲對象，但 Cespedes 只是懇切對待他們，醫生 Leon 則給予他們醫療服務。³¹ 據《遙かなる高麗》一書載，由於小西行長的安排，Cespedes 曾與

25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グレゴリオ・デ・セスペデス師の第二書簡〉，頁 267-270。

26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頁 46。山口正之，〈文祿役中朝鮮陣より発せし耶蘇會士セスペデスの書翰につきて〉，頁 176。

27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グレゴリオ・デ・セスペデス師の第二書簡〉，頁 270。

28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頁 51，註 120。

29 家入敏光譯，〈ルイス・フロイスの一五九六年度・年報〉，收入松田毅一監譯，《十六・七世紀イエス会日本報告集》第 1 期第 2 卷（京都：同朋社，1987），頁 137-138。

30 山口正之，〈文祿役中朝鮮陣より発せし耶蘇會士セスペデスの書翰につきて〉，頁 176。山口正之，〈日本耶蘇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頁 62-63。

31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頁 46-47。

中國使節及武將會面。他向中國使節表示：「日本人智慮深，能接納上帝的教義。皇帝若允許傳教士至中國，中國人大約亦能接受此教義。」而小西行長也熱心請求武將向皇帝傳達此意，武將亦允諾將努力使皇帝與官吏答應。³² 但因和談交涉無結果，至中國傳教一事終未實現。

Cespedes 滯留熊川的時間，有兩個月、一年、一年四個月等說法。³³ 小西行長將 Cespedes 送回日本後，為和約問題，秀吉亦召他回國。³⁴ 1595 年 4 月 29 日小西行長與寺沢廣高兩人離開熊川，5 月 6 日到達名護屋，6 月 26 日回釜山。³⁵ 因此 Cespedes 回日本必定在行長離開熊川之前。若在朝鮮一年，他離開熊川應該是 1595 年 1 月或 2 月。若曾與中國使節及武將會面，而此事又在 4 月，則他在熊川至少有一年四個月。至於小西行長為何送 Cespedes 回日本，根據 Frois (1532-1597)「一五九五年度年報」，原因是害怕加藤清正中傷。³⁶ 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兩人，因進兵漢城、送還朝鮮兩王子、議和等，意見與態度均不同，加上加藤清正是日蓮宗信徒，³⁷ 以致兩人處處對立。由於清正將行長召請傳教士至軍中一事上報秀吉，行長立即向秀吉說明其召請 Cespedes 是為打聽來自印度的葡萄牙船的消息。秀吉聽此說明後，並未追究。但行長仍恐懼清正惡意攻擊，因此快速將 Cespedes 送回名護屋。³⁸

32 同上註，頁 48。陳雲鵬、譚宗仁於 1595 年正月至熊川，沈惟敬於 4 月在熊川與小西行長會談，所謂使節與武將大約是指此三人。參見木村紀八郎，《小西行長伝》，頁 390-392。

33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頁 182。楠田斧三郎，《朝鮮天主教小史》（東京：大空社，1996），頁 8。ルイズデ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頁 42。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頁 212。

34 山口正之，〈日本耶蘇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頁 63、註 4。

35 木村紀八郎，《小西行長伝》，頁 393、395、397。島津亮二，《小西行長——「抹殺」されたキリシタン大名の実像》（東京：八木書店，2010），頁 153-154、155。

36 家入敏光譯，〈ルイス・フロイスの一五九五年度、年報〉，收入松田毅一監譯，《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 1 期第 2 卷，頁 68。

37 木村紀八郎，《小西行長伝》，頁 376-377。冠賢一，〈近世初頭日蓮宗とキリスト教の関連——肥後国における加藤清正の宗教政策〉，《日本佛教學會年報》62(1997.5): 249-251。古橋左衛門又玄，《清正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15 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28），卷 2，頁 699。

38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エン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頁 182-183。

Cespedes 途經對馬時，十三歲的朝鮮俘虜嘉兵衛（Vincent Cafioye）亦跟隨至日本，嘉兵衛後來受洗成為傳教士。³⁹ 之後，Cespedes 在有馬領地傳教。1597 年 2 月長崎二十六名教徒殉教後，轉移至豐前小倉，卒後葬於長崎。⁴⁰

日本侵略朝鮮期間，另有幾則傳教士至朝鮮的相關記載，如 1595 年大村喜前患重病，臨終前為請 Alfonso Lucena（1551-1623）至身旁，很快派遣船隻至大村港。Lucena 得到 Gomez 許可，立刻作出發準備。但第二天船行一小時後，大村喜前另外派遣的船隻抵達橫瀨浦灣口，通知 Lucena 止航，因大村喜前已脫離險境，結果 Lucena 未去成。⁴¹ 此外，據 Gomez 的秘書 Francisco Pasio（1553-1612）1598 年 10 月 3 日的記述，1597 年 3 月 20 日（或 24 日）秀吉給長崎奉行寺沢正成書信，要寺沢正成向在朝鮮的基督教大名傳達驅逐領內傳教士的命令，傳教士們必須至長崎集體等待離開。但在秀吉的命令實行前，已無葡萄牙船出航，傳教士仍停留在日本。耶穌會上長認為在高麗的教徒不能沒有靈的指導，遂藉此機會冒險派遣神父和修士二人至教徒最多的小西行長陣營。停留二個月期間，聽告解、洗禮、講道、授聖餐。教徒希望他們繼續留下來，但小西行長擔心被秀吉身旁的異教徒告發，因此勸兩人先回日本，稍經時日再出來。⁴² Pasio 未說明神父和修士為何人，且寺沢傳達秀吉書信的時間亦不清楚，但明確說明二位傳道士在朝鮮兩個月。另據 Francisco Pires（1563-1632）記載，Francisco de Laguna（1552-1617）曾於 1597 年至高麗，1598 年回日本。若將此兩記事合併解讀，似可推測神父是 Laguna，修士則是日本人田村 Romao（1553-1627）。他們至朝鮮的時間應是 1597 年 12 月至 1598 年 1 月。⁴³ Laguna 在朝鮮兩個月，與 Cespedes 相同，仍難有機會接觸朝鮮人。

據 Medina 記載，有位豐後武士看到很多高麗小孩在逃避戰火時被雙親

39 參見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入鮮計画〉，《青丘學叢》3(1931.2): 138 下-139 下。

40 山口正之，〈文祿役中朝鮮陣より発せし耶穌會士セスペデスの書翰につきて〉，頁 178-179。

41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頁 52-53。

42 同上註，頁 53-54。

43 同上註，頁 54-55。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頁 213。

遺棄，或被日軍認為太年幼沒有俘虜價值而丟棄，並眼看他們死亡，內心大受刺激。因此他對所有小孩，包括瀕死的幼兒，親自給予洗禮。並且命令隨從必須將水壺常掛腰際，若發現有類似小孩，就為他們洗禮，讓他們可以到天國，當時由此武士洗禮的小孩約二百人。所謂豐後武士，推測是大友義統或其家臣志賀親次（1566-?）。此訊息為 1592 至 1593 年間短暫回日本的其他教徒所傳回，⁴⁴ 因此二百小孩受洗應該是在此時期。由於大友義統的軍隊未到平壤，所以範圍大致在漢城及其周邊地區。Frois 於 1596 年之報告記載，日軍中有很多人因飢餓、生病而倒臥。大村軍中有位教徒，因同伴認為他無法久活，遂將他棄置小屋未予任何照顧。令人驚奇的是，在他瀕死前，出現三位衣著高貴的人，將手持大聖像放置牆壁，然後跪下祈禱，祈禱完即離去，如此連續二天。結果這位教徒病況不僅減輕，最後還完全康復。⁴⁵ Gomez 於 1597 年之報告則記載，大村喜前軍中一位重要武將，為了告解向喜前請求回大村，並應允告解結束後立即回軍隊。這位武將得到許可，並幸運回到日本。經過三次告解，拜領聖體後又回朝鮮。此後，其他人也學習他的例子。同報告又載，天草種元於 1595 年自朝鮮回領地。為徹底告解，他將自己禁閉密室八天。⁴⁶ 這些說明軍中沒有傳教士時，教徒仍藉信仰為朝鮮小孩洗禮、維持信心，或藉回國告解撫慰心靈。

耶穌會傳教士至朝鮮的時間很短，他們為教徒講道、聽告解、授洗，使教徒將士得到靈的慰藉，對已處於厭戰氣氛的士氣有提昇作用。由於害怕異教徒告發，他們的活動地區和接觸對象受限制。除少數軍中俘虜外，甚難與當地朝鮮人接觸。如 Leon 也是醫生，因此在聖靈工作外，醫療是重要服務。由大村喜前招請 Lucena 之例，說明為死亡的教徒祈禱也是他們的職責。因基督教大名的需求，傳教士被派遣至朝鮮，目的是撫慰大名屬下的將士。他們

44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頁 59、62-63，註 145。

45 家入敏光譯，〈ルイス・フロイスの一五九六年度・年報〉，頁 186。

46 家入敏光譯，〈一五九七年、日本副管区長ペドウロ・ゴメスのイエス会総長宛書簡〉，收入松田毅一監譯，《十六・七世紀イエス会日本報告集》第 1 期第 3 卷（京都：同朋社，1988），頁 85-86。非天草種元，應是其子天草久種。

或許也想藉機傳教，但並無成果。⁴⁷ 對朝鮮人之傳教，主要以被擄至日本的俘虜為對象，1594 年在長崎有一千三百名以上受洗。⁴⁸

三、日軍軍中的隨軍僧侶

日本自平安末期至鎌倉時代，無論是政治、社會或宗教，都有很大轉變。藤原氏衰亡、源平之爭；天災不斷，社會不安；寺院、僧侶腐敗墮落，以致末法意識深入人心，人人渴望從末法之世得到救贖。在此背景下，產生所謂鎌倉六宗，即淨土宗、淨土真宗（一向宗）、時宗、臨濟宗、曹洞宗、日蓮宗（法華宗）等新佛教。室町時代，尤其應仁之亂（1467-1477）後，這些新佛教在公家、武士及農民間擴大教勢。其中臨濟宗得到足利將軍及上層武士的信仰，與幕府穩固相結。其僧侶擔任外交使節、起草外交文書、負責對外事務等。⁴⁹

1592 至 1598 年侵略朝鮮期間，與大明、朝鮮和談交涉、書牘往來，均由兼具漢學素養的僧侶擔任。據《豐臣秀吉譜》載，秀吉赴名護屋大本營前，群臣建議應選有文才者隨行，以備與明、朝鮮書信往來時之需。秀吉答曰：讓朝鮮人使用「いろは」（伊呂波）即可。但經過考慮後，認為仍有必要。因此選派相國寺西笑承兌（1548-1608）、南禪寺玄圃靈山（?-1608）、東福寺惟杏永哲（?-1603）等三位禪僧隨行。⁵⁰ 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三禪僧隨秀吉同往名護屋則是事實。相國寺、東福寺屬京都五山，南禪寺則位居五山之上。西笑承兌長於文筆，參與之外交事務，如 1591 年 7 月回覆葡萄牙印度總督 Visorey 之國書、9 月給予呂宋總督之國書、1593 年 11 月要求高山國（臺灣）入貢之國書，及 1597 年 8 月回覆太泥國的國書等，均由其起草。

47 現有史料並未看到傳教士積極想至朝鮮傳教的跡象。參見柳田利夫，〈文祿、慶長の役とキリシタン宣教師〉，《史學》52(1982.6): 19 上-22 上。

48 家人敏光譯，〈ルイス・フロイスの一五九六年度・年報〉，頁 201。

49 參見伊藤幸司，〈中世日本の外交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 70-104、269-315。大隅和雄、中尾堯編，〈日本仏教史〉「中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 146-171。

50 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中冊（1658 年刊本），頁 35。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太洋社，1935），卷 38，天正 16 年 8 月 6 日條，頁 28 上下。

1592 年征伐朝鮮時，亦受命起草檄文。1596 年，明使楊方亨（1574-1615）、朝鮮使節黃慎至日本和談，他與靈山、永哲同任接待，並受命誦讀明皇帝璽書。⁵¹ 玄圃靈山爲鹿苑院有節瑞保（1548-1633）所推薦，以詞藻聞名，在名護屋常參與謀議。1596 年明使至日時，與之筆談、商量、草擬和平條件。⁵² 惟杏永哲爲東福寺正統庵僧侶，1590 年陞至南禪寺，以文墨受重禪林。1593 年爲傳達和談條件，曾赴釜山滯留數月，1596 年參與接待明使。⁵³

秀吉重用之僧侶，另有全宗（1526-1600）與惠瓊（1539-1600）二人。全宗最初在比叡山爲僧，1571 年織田信長（1534-1582）燒燬比叡山後，還俗隨曲直瀬道三習醫。得秀吉知遇爲侍醫、右筆，其後擔任施藥院使，並再度爲僧，任法印職。⁵⁴ 惠瓊爲安藝安國寺僧侶，原爲毛利輝元的外交使者。1582 年本能寺之變時，其幹旋毛利氏與秀吉議和，秀吉因此得以馳歸京都打敗明智光秀（?-1582），惠瓊與秀吉接近大約始於此時。1585 年征伐四國時，毛利軍以小早川隆景（1533-1597）爲主力進攻伊予，秀吉弟秀長（1540-1591）爲主將駐紮阿波，惠瓊則奔走於兩人之間。他成爲豐臣政權屬下之人，則是 1587 年出兵九州時擔任檢使，傳達秀吉旨意，在九州諸大名間折衝。1592 年秀吉赴名護屋時，他在備後神邊（廣島縣神邊町）迎接。之後，伴隨秀吉於 4 月 25 日抵達名護屋，28 日受命與寺沢正成趕赴朝鮮。5 月 4 日日軍佔領漢城後，諸將決議八道分治，毛利輝元經略慶尙道，小早川隆景經略全羅道。20 日惠瓊向在慶尙道星州的輝元傳達秀吉命令回送兵船之事後，6 月 7 日回釜山。因再次接到秀吉要其向諸將傳達建造行營之命令，因此未回名護屋。⁵⁵ 據金誠一之啓：

51 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 411-413。山鹿素行，《武家事紀》，收入《山鹿素行先生全集》（東京：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會，1916），卷 11 續集，頁 367 下-369 下。

52 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頁 410-411。

53 同上註，頁 409-410。

54 釋道契，《續日本高僧傳》，收入仏書刊行會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04 卷（東京：大法輪閣，2007），卷 11〈江州延暦寺沙門全宗傳〉，頁 209 下-210 上。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頁 415-416。

55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付編・解説〉，頁 85、93-94、106。

……六月中全羅監司稱號倭，自昌原直到咸安，欲渡宜寧之鼎津，為郭再祐所遏，即還金海，欲寇居昌，為金沔所卻。由知禮向茂朱縣，與忠清道賊合入錦山，連陷茂朱、龍潭、鎮安諸邑。全州之危迫在朝夕，賊幸不利而退，千餘名潛還本道。⁵⁶

全羅監司即惠瓊，由此啓知其六月中已自稱此號。監司為統轄一道民政、軍政、財政、刑政等之觀察使，顯示惠瓊欲藉此官銜撫綏全羅道百姓。他率領軍隊進攻鼎津、居昌，卻分別為郭再祐（1552-1617）、金沔（1541-1593）所敗。之後進兵錦山、茂朱等地，並在錦山作榜文勸朝鮮武官歸降。⁵⁷九月中旬，錦山、茂朱二地棄守。由於輝元生病，1593年閏9月隨同回國，在朝鮮約一年半。⁵⁸1597年二次出兵朝鮮時，毛利軍由輝元養子秀元（1579-1650）率領，輝元叔父吉川廣家（1561-1625）隨同出征，惠瓊則以奉行和秀元之監護人再次渡海。10月營建蔚山城時，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及秀元部將穴戶元續共同監工。⁵⁹12月大致完工後，回秀元駐守地梁山。22日明軍圍攻蔚山城，1598年正月4日秀元之救援軍亦到達大和江畔，各援軍決議5日總攻擊。但吉川廣家觀察到明軍有退卻之意，欲先渡河出擊。惠瓊知此事後，責備廣家違背軍法。廣家言：「兵法委由武士，僧侶辦法會、修行無須指導軍法。」⁶⁰因此仍先進擊。戰後，惠瓊將毛利諸將之戰功悉向秀吉與輝元報告。因不滿廣家，獨不呈報廣家，⁶¹此導致日後二人之對立衝突。惠瓊始終追隨毛利氏，其擔任豐臣秀吉與毛利氏間之橋樑，傳達秀吉軍令，奔走於各戰場，與武將們交涉、調停、軍法建言等。

秀吉任用僧侶起草外交文書、接待大明使節、從事和談交涉、傳達軍令

56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2冊（漢城：趙台熙，1964），壬辰8月條，頁5下-6上。

57 同上註，第1冊，壬辰7月條，頁79下-80上。

58 同上註，第2冊，壬辰9月條，頁21上。

59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朝鮮記乾〉，頁300下。

60 《吉川家文書》第1冊，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9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723號〈毛利輝元自筆書狀〉，頁667-668。河合正治，《安國寺惠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1），頁109。

61 《毛利家文書》第3冊，收入《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8卷，914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75-177。

等，而出征朝鮮之大名亦有隨軍僧侶擔任起草榜文、軍事折衝、施藥醫療、從事戰鬥等。如小西行長與宗義智軍中有京都花園妙心寺天荊、博多聖福寺景轍玄蘇（1537-1611）、府中長壽院竹溪宗逸、三玄；加藤清正軍中有熊本妙寺日眞（1565-1626）、在田、天祐、東福寺文英清韓（1568-1621）、妙教寺日勝、大川和尚；鍋島直茂（1538-1618）軍中有佐賀泰長院是琢明琳；吉川廣家軍中有宿蘆俊岳；小早川隆景軍中有安國寺惠瓊；太田一吉（?-1617）軍中有安養寺慶念、了眞；⁶² 島津忠恒（1576-1638）「御供衆」中，有面高連長坊殿、市來大日寺、志布志大慈寺、平田大休坊殿、慶垣坊、八木良三學坊、萩野三住坊等。⁶³ 天荊、景轍玄蘇、竹溪宗逸、三玄、文英清韓、是琢明琳、宿蘆俊岳、惠瓊均為臨濟宗禪僧，日眞、在田、天祐為日蓮僧，慶念、了眞為眞宗僧，面高連長坊等御供衆為修驗僧。

鎌倉時代，禪僧常渡海至中國，也有機會與渡日僧侶接觸。他們學習儒學，尤其是程朱學及相關典籍。室町時期，五山僧侶成為學問中心。戰國時代，通曉儒學的僧侶則協助各國大名治理國政。⁶⁴ 日蓮宗於十六世紀發展成畿內一大軍事勢力，眞宗門徒在各地之抗爭對大名、武士亦形成威脅。⁶⁵ 法華一揆與一向一揆是戰國時代佛教的特徵，兩宗僧侶均有參與戰鬥之經驗。至於御供衆，因其隨島津忠恒參與南原、蔚山、泗川等戰役，⁶⁶ 因之可推測

62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1990），頁 147-156。木村紀八郎，《小西行長伝》，頁 236、305。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第 8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2），〈甲午七月再入清正陣中探情記〉，頁 87 上。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卷 89「30 年 6 月壬戌條」，頁 98 下。慶念著，《朝鮮日々記》，《朝鮮學報》第 35 輯（1965.5）：129，慶長 2 年（1597）12 月 23 日條。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收入佐賀県史編纂委員會編，《佐賀県史料集成》（佐賀：佐賀県立圖書館，1960），〈古文書編〉第 5 卷，頁 351-360。天荊，《西征日記》，收入国書刊行会編，《続々群書類從》第 3 冊（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会，1970），5 月 18 日條，頁 680 下。

63 《島津家高麗軍秘録》，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20 輯下，頁 358 下-359 上、下。御供衆：供奉將軍出行。

64 大隅和雄、中尾堯編，《日本仏教史》「中世」，頁 222-224、264-267。

65 同上註，頁 178-187、190-219。

66 島津久通等編，《征韓録》，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

其亦是軍事要員，但也有擔任文書記錄如面高連長坊者。

無論是禪僧、日蓮僧、眞宗僧、修驗僧，他們隨大名出征朝鮮，在大名軍陣中擔任各種工作。由於與明、朝鮮之軍事折衝、和談交涉均由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主導，此兩軍軍中的僧侶因此成爲雙方溝通的橋樑。天荊曾於 1579 年與 1587 年以「右武衛殿」的使節名義至朝鮮，⁶⁷ 景轍玄蘇則於 1580 年與 1589 年以日本國王使節名義赴朝鮮，⁶⁸ 二人均熟悉往漢城之道路。1592 年 4 月 27 日，小西行長攻下忠州後，翌日即召請天荊與景轍玄蘇，展開朝鮮地圖商討進兵漢城之路線。⁶⁹ 5 月 4 日進入漢城，翌日小西行長又召天荊入營。據《西征日記》載：

五日晴，已刻應攝州之招到彼營。有大明通事小解文字，攝州命余筆談。問大明里數，河之大小，路之平險，彼答其大概。彼問我答，我問彼答，墨十餘紙。座仙巢、竹溪在。⁷⁰

天荊與明通事筆談，問答十餘紙，景轍玄蘇與竹溪宗逸同在座。之後，小西軍與朝鮮軍在臨津江對峙。因小西行長之令，留在漢城的天荊與柳川調信立刻至坡州（距漢城八里）。在此天荊以柳川調信之名，連續草書二封短書勸朝鮮和談。⁷¹ 此外，天荊在仁同代小西行長草擬安民榜文，亦應加藤清正家臣立本（齋藤利光）之請對佔領地百姓及文武官吏草作榜文。⁷²

玄蘇於 1579 年受宗義調（1532-1589）之邀至對馬，1589 年赴朝鮮時，

1966），卷 4〈南原之城陷事附全州城明退事〉、〈大明勢朝鮮に来る事附明兵蔚山之城を囲む事〉，頁 243-246、255-259；卷 5〈慶長三年十月朔日泗川合戦之事〉，頁 288-296。

67 中村栄孝，〈「右武衛殿」の朝鮮遣使〉，收入氏著，《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頁 749。

68 松田甲述，〈僧玄蘇朝鮮の初旅〉，收入氏著，《續日鮮史話》（東京：原書房，1976），頁 2-4。長正統，〈景轍玄蘇について——一外交僧の出自と法系〉，《朝鮮學報》29（1963.10）：139 上下。

69 天荊，《西征日記》，4 月 27 日、28 日條，頁 678 上。

70 同上註，5 月 5 日條，頁 678 下。大明通事即張大膳。

71 同上註，5 月 13 日、14 日、15 日、16 日條，頁 679 上-680 下。

72 同上註，4 月 22 日條，頁 677 下；5 月 21 日條，頁 681 上。

朝鮮對其之評語爲：「玄蘇倭人中頗通文字，而喜作詩，又必能文。」⁷³ 小西行長在這場戰爭中始終主和，與明、朝鮮多次交涉，雙方會談玄蘇亦多次參與。如 1592 年在大同江上與朝鮮禮曹參判李德馨(1561-1613)會談；⁷⁴ 1593 年在龍山與明遊擊沈惟敬三次會談。⁷⁵ 1594 年在咸安與朝鮮慶尙右兵使金應瑞會談。⁷⁶ 1595 年 1 月，在熊川與明遊擊陳雲鴻會談。⁷⁷ 同年 4 月沈惟敬攜勅書至小西行長營中，「行長跪聽，倭僧玄蘇誦畢，叩頭謝恩。」⁷⁸ 翌年秀吉要求朝鮮派遣謝恩使時，朝鮮群臣意見分歧，玄蘇則極力向黃愼勸說。⁷⁹ 《宣祖實錄》載：「倭僧玄蘇者，……粗解中國文字，故常置軍中。」「玄蘇、平義智等，管對馬島倭。凡文黑（墨）論議，玄蘇、竹溪專管爲之云。」「行長不識字，玄蘇在傍看過，即傳說行長。」「玄蘇以筆札問答，而傳諭行長。如行長惡聞之語，則似不盡爲說道矣。」⁸⁰ 玄蘇在小西行長軍中，論議折衝、接待來使、譯誦誥命等。其曾言：「關白處所爲，則我容有未之聞者。若行長所爲，則唯我與聞，他人皆不得參。」⁸¹ 朝鮮認爲秀吉是侵略元凶，玄蘇在小西行長軍中是軍師，因此是侵略主謀。不僅稱他爲妖僧，若能擒斬他，則賞銀與擒斬秀吉一樣同爲萬兩，並封伯世襲。宗逸是玄蘇的從僧，在小西行長軍中亦視同軍師。若擒斬宗逸，則與擒斬行長、宗義智相同，賞銀五千兩，世襲指揮使。⁸² 可知二人在小西行長軍中之重要性。

相對於小西行長與沈惟敬會談，加藤清正會談的對象爲朝鮮義僧將松雲惟政（1544-1610）。《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載：

73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 24「23 年正月庚申條」，頁 302 上。

74 同上註，卷 27「25 年 6 月丁酉條」，頁 327 上。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卷 27「26 年 4 月乙酉條」，頁 242 下。

75 沈惟敬於 3 月 8 日、15 日、4 月 1 日三次至龍山。參見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 36「26 年 3 月癸亥條」，頁 485 下；「庚午條」，頁 491 下、492 上。

76 同上註，卷 58「27 年 12 月庚戌條」，頁 210 上。

77 同上註，卷 60「28 年 2 月乙巳條」，頁 231 下-232 上；「癸丑條」，頁 238 上-240 下。

78 同上註，卷 63「28 年 5 月壬午條」，頁 298 下。

79 同上註，卷 71「29 年正月庚午條」，頁 423 下-428 下；「戊辰條」，頁 422 下-423 上。

80 同上註，卷 32「25 年 11 月丁卯條」，頁 394 下；卷 60「28 年 2 月癸丑條」，頁 241 下；卷 50「27 年 4 月乙丑條」，頁 54 下。

81 同上註，卷 70「28 年 12 月己未條」，頁 418 上。

82 同上註，卷 34「26 年正月壬戌條」，頁 426 上；「丁卯條」，頁 433 上。

蓋自癸巳（1593 年）以後，天將主力和議，沈惟敬與平行長議欲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以撤其兵。而劉綎則交通清正，欲使清正乘時受封，自為關白，反擊秀吉。故特遣松雲以探本情。⁸³

松雲惟政與加藤清正會談，是因劉綎派遣。日軍自漢城撤退後，加藤清正駐守蔚山、西生浦。劉綎於 1594 年 4 月、7 月、12 月，三次派遣惟政至西生浦。會談內容主要是議和五條件，並藉機離間清正與行長二人。⁸⁴ 三次會談，日真、在田、天祐三僧均參與。⁸⁵ 十二月之會談，清正未見惟政，而由寵將喜八傳言曰：「我非不欲引來相見，汝國方與行長輩講和，恐被嫌於彼人也。茲送在田、天祐兩高僧與我同志者，君等如有所欲言，當與此僧等，盡言無諱可也。」⁸⁶ 據〈甲午七月再入清正陣中探情記〉載，惟政「以督府書給清正，清正使僧倭輩開見後，清正執筆以日本之書書給僧倭，僧倭以此國書書示我等。」⁸⁷ 即雙方之會談，或清正書寫己意由三僧轉譯，或將惟政之意由三僧開讀清正聽之，以「書示」、「書答」筆談方式進行。喜八曾對惟政言：「我國議大事則以高僧召議矣，貴國亦以高僧送來者，以重此事也。悅之深，信之篤。」⁸⁸ 說明由高僧議事是日本慣例，與同為高僧的惟政會談，是可喜、可信之事。

至於文英清韓，1597 年 3 月惟政再至西生浦，6 月縣監蔣希春（1556-1618）亦至西生浦，兩人與清韓均有問答。此次惟政未見一真，⁸⁹ 曾問一真何在。清韓出示一真之書簡，內有「五月大軍出去時，吾將隨去」之語。⁹⁰ 清

83 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甲午四月入清正營中探情記〉，頁 80 上-中。

84 同上註，頁 81 中、83 上-下。

85 日真於 1594 年與林藏坊日禪等 10 人入清正軍營，1596 年 9 月隨清正返國。立正大學日蓮教學研究所編，《日蓮教團全史》（京都：平樂寺書店，1984），頁 561-562。

86 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甲午十二月復入清正營中探情記〉，頁 94 下-95 上中。

87 同上註，〈甲午七月再入清正陣中探情記〉，頁 85 上。

88 同上註，〈甲午四月入清正營中探情記〉，頁 80 下。

89 實錄亦記載為一真，參見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 61「28 年 3 月 24 日條」，頁 270 上。

90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 87「30 年 4 月辛未條」，頁 50 下；「癸酉條」，頁 54 上下；卷 89「30 年 6 月壬戌條」，頁 98 下。惟政與清正之會談，參見貫井正之，〈壬辰丁酉倭亂および戦後の日朝交渉における惟政（松雲大師）の活動に関する考察〉，

正軍中之僧侶，亦交涉會談、接待來使，並隨軍移動。但因清正「恐被嫌」，與小西行長軍中之天荊與景轍玄蘇相較，外交活動亦較少。

其他各軍將領並未參與和談，其軍中之僧侶，或安撫占領區百姓，或施藥醫療，或從事戰鬥。宿蘆俊岳隨吉川廣家從軍，由其《宿蘆稿》知廣家的軍隊，1592 年 4 月 29 日於釜山上陸後，經靈山→星州→醴泉→聞慶→忠州→漢城→開城。1593 年正月 19 日離開開城，2 月 28 日回到東萊釜山浦，9 月 1 日回國，⁹¹ 前後約一年五個月。俊岳在靈山奉毛利輝元之令，撫育四鄰遺民。《宿蘆稿》載：「見駐高駕於靈山縣，僕亦奉賢相公鈞命，撫育當縣四鄰之遺民，筆談面聽訟者日于奄矣。」⁹² 6 月 15 日與龍宮縣監禹伏龍相戰前，曾通書四次勸降。《宿蘆稿》載：「汝等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人人乞降來，則何須誅戮乎，否則煩頸不旋踵者也。」⁹³ 戰後，與老者張天覺筆談作戰情形。軍隊撤至釜山後，與金井山仙菴寺長老筆談。俊岳在釜山上陸時，有「朝鮮風俗始來識，言語不通通以文」⁹⁴ 詩句。即語言雖異，仍可以文字相通。

是琢明琳未隨同鍋島直茂渡海，他 4 月 23 日出發，5 月 7 日到達釜山，28 日進入漢城。6 月 1 日離開漢城，抵達開城後，渡西江至寶山館（驛）。在此之前，日記中屢有「棹扁舟」、「駕扁舟」、「乘扁舟」之語，因此可以推測他尚未與直茂軍會合。之後，日記載：「自此次第有叢山峻嶺，深谷曠野石川」、「只向良方」。⁹⁵ 清正與直茂的軍隊往咸鏡道東北前進是在 6 月 10 日，⁹⁶ 從時程推測，是琢至寶山館後，已與直茂軍會合。其後隨直茂軍移陣，7 月 21 日到達咸興，直茂在此設本營。1593 年正月平壤之戰失敗後，2 月晦日隨軍回漢城，5 月 17 日撤退至蔚山，28 日轉移至西生浦。6 月 18 日各軍進攻晉州時，因病未隨行。⁹⁷ 1592 年 6 月，他為清正在咸鏡道草作榜文，亦為

《朝鮮學報》178(2001.1): 108-121。

91 宿蘆俊岳，《宿蘆稿》，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13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9），卷 356，頁 999 下-1009 上。

92 同上註，頁 1000 上。

93 同上註，頁 1001 下。

94 同上註，頁 1002 上、1007 上、999 下。

95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頁 353。

96 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頁 285。

97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頁 352、353、354、356。

毛利吉成在江原道草作相同旨意的榜文。⁹⁸ 1593年2月4日清正將俘虜臨海君與順和君二王子送至直茂處，翌日是琢會見二王子並呈詩曰：「可憐天上鳳凰兒，飛入雞群失德儀；咸鏡蒙塵何似處，蝕非月辱是斯時。」⁹⁹ 未隨軍進攻晉州之是琢，據其日記載：

予臥病不能從軍，而駕孤舟漂泊於機張、釜山浦、加德、天城、金海、熊川之間也。夷則（陰曆七月）十有五日，繫舟於金海府東十里之佛岩江矣，今則結半間矮屋於竹島之新城。……烏兔推移，已雖滿三年，未得歸粉里，思之在于茲乎。¹⁰⁰

他駕孤舟漂泊機張等地，最後在竹島構築矮屋居住。竹島為直茂、勝茂父子營建並駐守，¹⁰¹ 在此他「獨寄半窗下，尋思故國之江山」，寄情詩賦而已。¹⁰²

慶念為豐後臼杵安養寺住持，1597年6月24日隨臼杵城主太田一吉渡海至朝鮮，1598年2月2日返回臼杵，計七個多月。慶念當時六十二歲，隨軍出征非其所願。其於日記之始記載：「以此老軀出陣，作夢亦未思及。」並建議「若須醫僧，可否徵召年輕者。」¹⁰³ 當時隨軍醫生限定五十歲以下，¹⁰⁴ 慶念以此年紀出征實屬特例。他雖感困惑，亦不敢違抗。

作為侍醫及隨軍僧醫，他照顧主君及傷兵。主君生病時，為主君把脈，注意其飲食。¹⁰⁵ 蔚山之戰，明軍襲擊城外毛利軍陣營，赴援之太田一吉軍亦被明軍包圍。結果一吉中箭受傷，當晚慶念徹夜照顧。¹⁰⁶ 攻陷南原時，受傷士兵衆多，因此他多日忙於照顧。¹⁰⁷ 對真宗僧侶、門徒而言，最重要是法事。

98 《泰長院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頁3右、左，頁4右、左。

99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頁353-354。

100 同上註，頁356。

101 同上註，頁360。伴三千雄，〈南韓に於ける慶長文祿の築城〉5，《歷史地理》37.4（1921.4）：281-282。

102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頁356-360。

103 慶念，《朝鮮日々記》，頁59、148。《島津家文書》，收入《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16卷，402號〈豐臣秀吉高麗再度出勢法度〉，頁393-394。

104 多聞院英俊，《多聞院日記》，收入竹內理三編，《增補續史料大成》第41卷（京都：臨川書店，2002），卷39，文祿2年2月26日條，頁387上。

105 慶念，《朝鮮日々記》，9月2日條，頁76；23日條，頁82。

106 同上註，12月22日條，頁127-128。

107 同上註，8月21日條，頁73-74。

毎月証如（1516-1554）、顯如（1543-1592）、親鸞（1173-1263）之御逮夜（忌日前一天）、御命日（忌日），¹⁰⁸ 慶念必與伴僧了真禮拜唸佛。¹⁰⁹ 除醫療本職外，禮拜、唸佛是他生活的重心。

面高連長坊於 1594 年 10 月 30 日隨島津忠恒至巨濟島，翌年 8 月移駐加德島。¹¹⁰ 島津忠恒在巨濟島與加德島營建蹴鞠場、茶室、書院，舉行蹴鞠、茶會、連歌，¹¹¹ 或獵虎、獵鷹。¹¹² 由於和談破裂，戰爭再起。1597 年 7 月漆川梁海戰後，日軍分左右兩軍，島津軍隸屬左軍。7 月 28 日島津軍由巨濟島出發，在慶尙道固城登陸。面高連長坊之日記即自此日開始，之後記錄進兵路線，如 8 月 16 日攻陷南原，19 日進入全州（以上全羅北道）。9 月 4 日到達扶餘，經林川、飾川（舒川）（以上忠清南道）、金溝、井邑（以上全羅北道）、長城、羅州、靈岩，26 日抵達海南（以上全羅南道）。10 月 28 日至慶尙道泗川，在此築城屯駐。日記至 12 月 29 日止。¹¹³ 作為御供衆，平日奉侍忠恒遊興。但因忠恒參與南原、蔚山、泗川等戰役，知御供衆亦參與戰鬥。

僧侶隨軍不僅在名護屋，更且遠至朝鮮半島。不僅五山禪僧，還有日蓮僧、眞宗僧及修驗僧。他們多半應主君要求而隨軍，但也有如慶念對參戰猶豫卻不敢違抗者。他們在軍中從事交涉、文書、顧問、醫療、戰鬥等。

108 大桑齊，〈善知識と「あさまし」の思想〉，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眞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京都：法藏館，2000），頁 259-261。

109 內藤雋輔，〈僧慶念の「朝鮮日々記」について〉，《朝鮮學報》35(1965.5): 165。

110 島津義弘與嫡子久保駐守巨濟島，1593 年 9 月久保病死改以忠恒代替。島津久通等編，《征韓錄》，卷 1〈諸將朝鮮に到て著陣之事附御朱印之事〉，頁 152；卷 3〈久保主逝去之事〉、〈忠恒主朝鮮渡海之事〉，頁 207、217。

111 《旧記雜錄》後編 2，收入鹿兒島県維新史料編さん，《鹿兒島県史料》（東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1983），卷 33〈高麗入日記〉，文祿 3 年 11 月 2 日、3 日、4 日、22 日，頁 847 上下、848 上、851 下；12 月 17 日、27 日，頁 854 上、855 下。

112 島津久通等編，《征韓錄》，卷 3〈虎狩之事〉，頁 218。《旧記雜錄》後編 2，卷 34〈家久公御譜中〉，文祿 4 年 3 月 11 日，頁 869 下-870 上。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5 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9 月 2 日、4 日、10 日、26 日、27 日，頁 636、638、641；10 月 7 日、23 日，頁 643、646；12 月 2 日、16 日、19 日、21 日、29 日，頁 647、650、651、654。

113 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頁 631-634、636-637、639、641、647、654。《旧記雜錄》後編 3，卷 38〈島津義弘書狀〉，慶長 2 年 5 月 5 日條，頁 100 上-101 上。

四、隨軍僧侶的思維

隨軍僧侶並非均留有紀錄，因此其思維僅能就有限的日記大略分析。這些僧侶分屬不同宗派，但仍以禪僧居多。室町時代五山禪僧已備顧問、執掌外交、處理文書，他們熟悉儒教。此次隨軍在朝鮮半島各征服地起草之榜文，即呈現儒家安民、恤民的統治理念。如天荊在仁同草擬之榜文：

散民速還于本宅，而男耕田稼苗，女採桑畜蠶，士農工商各修家業。若吾軍士有犯法以妨汝之業者，必罰矣。¹¹⁴

他代加藤清正家臣齋藤利光針對庶民與官吏草作二榜文：

示諭境內之黎民及鰥寡孤獨，僕奉吾殿下之命，撫當境，要除苛政，而布善政，救民於塗炭。速還舊居，以各修家業。勿疑勿疑。

呈示境內之文武官僚，奉吾殿下之命，安撫此境內。僕雖不敏，要布善政於境內。各還本宅，以精我藝，則必應其器以受職矣。先服者賞之，不服者罰之。請計之。¹¹⁵

是琢明琳為清正在咸鏡道草擬之榜文：

夫日本國關白殿下為改易于朝鮮國之政化，率軍勢矣。然則朝鮮國王既退去城都，雖然如此，敢非可誅王於致降從者，當令安住郡傍也。因茲使諸將分縣治之，至此國者豐臣朝臣清正傳命詔專制法也。自今不可（有）無道之儀，更勿疑乎。越土民等，速令歸宅，（可）專農耕者也。知之，知之。¹¹⁶

為毛利吉成在江原道草作之榜文：

……前者報送信文而以招金化、金城之六伯，則速領土民而以飯其家，命給糧米也。當茲則歛谷之六伯，見其文而一無來現，可勝痛哉。今者千萬勿疑，共領人民而以飯本家，則官倉之米穀可為計給也。火迫馳走而來現，如何幸。有不現，則何敢更言乎。餘可善處。而此地之民然，某一人先現，

114 天荊，《西征日記》，4月22日條，頁677下。

115 同上註，5月21日條，頁681上。

116 《泰長院文書》，頁3右、左。

則可賜田宅而完戶也。此意知悉。¹¹⁷

惠瓊在錦山所作之榜文，有「大日本大王施政道於朝鮮，欲恤羣氓戶。」之語。¹¹⁸毛利輝元之從軍僧在慶尙道起草之榜文，有「永行日本禮樂於此邦，而要移風換俗也。……業其農者勤耕農。」¹¹⁹男耕女織，四民各安其業；除苛政，行善政，救民於塗炭，以仁政示諭朝鮮百姓及鰥寡孤獨；甚且施行日本禮樂，欲移風易俗。

奈良時代已有不少神功皇后與朝鮮問題相關連之記載。¹²⁰中世因蒙古侵襲，對神功皇后之事蹟附加更多新內容。如皇后使用旱珠與滿珠打敗新羅，新羅投降後，皇后以弓弭在大盤石上書寫「新羅國大王，日本國之犬也。」並約定此後「備奉年貢事」。¹²¹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後，神功皇后征三韓再度被頌揚。如隨加藤清正從軍的家臣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鍋島直茂家臣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松浦鎮信家臣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均有皇后征三韓之敘述。¹²²《宿蘆稿》載：

昔時，神功皇后欲治異國，異國忽乞降，皇后聽焉。自忠州而歸本朝，直以弓劃石曰：唐土王者日本犬也。至今膾炙世俗之人口矣。又今軍旅於忠州，而追憶往事矣。皇后所劃之石，今安在哉矣。詩曰：神功無處不聲名，昔到此州俱決爭；皇后一從留記後，點頭頑石是吾兵。¹²³

吉川廣家之隨軍禪僧宿蘆俊岳在忠州憶起神功皇后，並留下稱讚皇后的詩

117 同上註，頁 4 右、左。

118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 1 冊，壬辰年 7 月條，頁 79 下。

119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本篇，附記第 5〈民政及賑恤〉，頁 158。

120 參見羅麗馨，〈日本人的朝鮮觀——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新史學》18.3(2007.9): 193-194。

121 萩原龍夫校注，《八幡愚童記》乙，收入櫻井德太郎、萩原龍夫、宮田登編，《日本思想大系 20：寺社緣起》（東京：岩波書店，1975），解說文，頁 207。

122 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続々群書類從》第 4 冊，〈高麗陣被思召立藍（濫）觴之事〉，頁 294 上。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秀吉の朝鮮侵略とその歴史的告発》（東京：株式會社そしえて，1982），5 月 28 日條，頁 378 下。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20 輯下，頁 378 下。

123 宿蘆俊岳，《宿蘆稿》，頁 1003 下。

句。戰國時代，九州大名每有約定大都以八幡神爲誓。八幡母神神功皇后征服三韓之傳說，大約也因此流傳於從軍武士之間，¹²⁴並爲隨軍僧侶所熟知。

由隨軍禪僧對朝鮮製作之文書，亦可看到多將兵端之起歸於朝鮮。天荊在臨津江製作之文書：

……吾殿下欲假道而擊大明，雖諸將奉命來于此，不欲自此經數千里入大明。是故先與貴國和親，而後爲借貴國一言，以講和於大明也。……殿下亦不欲與貴國絕交，貴國失隣好之道，拒吾軍，故吾軍亦動干戈而已。……¹²⁵

第二次出兵朝鮮時發布之檄文：

前年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卒不達大明，無禮多々，其罪一。既依沈督指揮寬宥二王子竝夫妻以下，不先致禮謝，隨明使過海之役，歷數日而王子不親來，唯馳黃朴之賤价，其罪二。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覆，經歷數年，其罪三。右件々之大罪，雖天地豈能可蔽之乎。明春舉百萬大兵屠殲朝鮮禽王李昞，懸首於日本獄門。且國城亦一炬成焦土者，猶指諸掌。爾莫悔。¹²⁶

朝鮮失隣好之道、無禮、二王子不赴日、和談不成，因此日本動兵。文書之外，雙方會談時亦流露有此意識。如景轍玄蘇與李德馨在大同江會談，據《宣祖實錄》載：「賊曰：日本非與貴國相戰。頃於東萊、尙州、龍仁等地，皆送書契，貴國不答，以兵相接，吾等遂至此。」¹²⁷

隨軍眞宗僧侶，史料明確記載者有明念、勝念父子與慶念三人。明念爲山口端坊住持，1565年毛利氏與出雲尼子相戰時支持毛利氏，與毛利氏關係深厚。¹²⁸1592年4月隨毛利元就（1497-1571）第三子小早川隆景從軍。根據「端坊由緒書」，毛利軍中有眞宗門徒，小早川隆景以「軍略與弘法」之目

124 藤木久志，《織田・豐臣政權》（東京：小學館，1975），頁375。

125 天荊，《西征日記》，5月16日條，頁680上。

126 大関定祐，《朝鮮征伐記》（東京：國史研究會，1917），第10，頁38。

127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27「25年6月丁酉條」，頁327上。

128 草野顯之，〈本願寺教団の朝鮮進出——関連史料を読む〉，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眞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頁355。

的，向本願寺上人請託希望明念隨行。得到上人許可，明念因此隨之渡海。¹²⁹ 他甚且得小早川隆景之助，於釜山建道場。根據《蓮莖一糸》，明念之子勝念亦渡海朝鮮。他在朝鮮說法，強調「惡人成佛」與「一念滅罪」。¹³⁰ 即在戰場上，縱使殘忍殺戮，亦能得彌陀如來救贖；只要有信心唸一聲佛，即可消除所犯罪惡。此說法可為兵士消解墜入地獄之恐懼，維持戰鬥意志。¹³¹ 弘法即鼓舞士氣，小早川隆景以此期待真宗僧侶，明念、勝念亦有藉此隨軍機會發展教團之思維。

慶念在軍中，無論何種情況，始終維持信仰之心。在釜山上陸後，隨即參詣真宗寺院。¹³² 他崇拜善知識，對他而言，親鸞是開山宗祖聖人，証如是前住上人，顯如是現住上人，三人即是善知識。12、13 日，23、24 日，27、28 日分別為証如、顯如、親鸞之御逮夜與御命日，¹³³ 每月此六日，他安置御名號，以莊嚴之心禮拜唸佛。¹³⁴ 尤其 23、24 日顯如之御逮夜與御命日，在安養寺時，必以供品、供花奉祀顯如之御影。但八月、九月此二日，因忙於照顧傷兵，及連日行軍極度疲勞，均無法行報恩講（報恩謝德法會），對此他感到羞愧。¹³⁵

其隨軍日記計有三百三十餘首和歌，其中七十餘首與佛教有關。¹³⁶ 慶念精通真宗教典，他常引用《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等三部

129 毛利元就信仰真宗。《毛利家文書》，405 號〈毛利元就自筆書狀〉，頁 95-96。大原誠，〈「端坊由緒書」について〉，《佛教史研究》40(2004.3): 114 下-115 上。

130 《蓮莖一糸》（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木活字版），〈端坊明勝於朝鮮軍中真宗安心之法談〉，頁 15 上。

131 〈十一代上人御書〉，神奈川県企画調査部県史編輯室編，《神奈川県史》資料編 3 上（横浜：神奈川県企画調査部，1975），頁 768，有「時眾同道之事，十念為一大事也。」即時宗認為「南無阿彌陀佛」需唸十遍。勝念認為真心唸一遍即可。

132 慶念，《朝鮮日々記》，7 月 7 日、11 日條，頁 63、64。

133 大桑齊，〈善知識と「あさまし」の思想〉，頁 259-261。

134 内藤雋輔，〈僧慶念の「朝鮮日々記」について〉，頁 165。御名號即阿彌陀如來方便法身之尊號。

135 平田厚志，〈「うき世」から「ミヤこ」への旅路〉，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頁 283-285。

136 内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76），第 6 章〈僧慶念「朝鮮日々記」〉，解說，頁 651。

經，及親鸞之《教行信証》、《正信偈》、《三帖和讃》、《愚禿鈔》、《淨土文類聚鈔》，覺如（1270-1351）之《口傳鈔》、《報恩講私記》，存覺（1290-1373）之《持名鈔》、《淨土真要鈔》、《淨土見聞集》，蓮如（1415-1499）之《御文》等本願寺歷代宗主之著述。¹³⁷ 他每月勤於報恩講，但未有布教活動。石山之戰（1570-1580）失敗，本願寺向織田信長屈服後，蓮如（1415-1499）之「王法爲本」說成爲教權從屬政權正當化之理論根據。¹³⁸ 對這場侵略戰爭，他並未給予正面批判。

日記中九十餘首和歌與戰爭有關，但僅提及南原之役與蔚山之役。¹³⁹ 日記多半描述戰鬥後的景象及沿途慘狀，如焚燒山野、殺戮民衆、親子離散、哭泣叫喚，他形容宛如阿修羅的戰場。又如俘虜朝鮮男女老幼、日本商人買賣朝鮮奴隸、掠奪糧食等。修建蔚山城時，動員鍛冶匠、木匠，及鐵砲手、步卒、幟衆、母衣（軍中巡視、傳令）、船手（夫）、人足（搬運之人力）等，不分晝夜，酷使人役。若有不慎或過失，則入牢、枷首、烙印，甚至斬首。他認爲此種不仁道，無疑將墜入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並感嘆這世間正走向地獄。對運送物質之牛馬不再能使用時便宰殺之，認爲因果輪迴必墮入畜生道。他以身在此貪欲心、瞋恚之夷國，自戒不要墮落步三惡之道。當蔚山城受明軍與朝鮮軍攻擊時，他和伴僧了眞都有死的覺悟。他認爲雖遠在異國，如果就此往生，亦可「神通自在」轉身成佛，得到「大快樂」（喜悅無煩惱），隨心所欲無處不能往，因此在諸將奮戰時，他決意絲毫不動靜待往生。¹⁴⁰

137 早島有毅，〈慶念の生涯と文化的素養〉，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頁 154-155。同書，《朝鮮日々記》本文，11 月 21 日、22 日、24 日、25 日、27 日條，12 月 24 日條等註，頁 50-58。

138 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補註，〈王法をまほるおきて〉，頁 112 下-113 上。

139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第 6 章〈僧慶念「朝鮮日々記」〉，解説，頁 652。慶念，《朝鮮日々記》，8 月 13-15 日條、12 月 22-26 日條、（1598 年）正月 2-4 日條，頁 72、127-131、132-133。

140 慶念，《朝鮮日々記》，8 月 4 日、6 日條，頁 69、70；7 月 9 日、8 月 8 日、10 月 4 日、11 月 19 日條，頁 63、70、85、104；11 月 11-13 日、20 日條，頁 99-101、104-105；10 月 29 日條，頁 93；12 月 23 日、27 日條，頁 128-129、131。

日記中思鄉、思親之和歌有七十餘首，¹⁴¹ 他思念家鄉妻子、兒孫、母親，這類情緒之表達，在他生病、孤寂及蔚山籠城期間特別明顯。如在竹島病重時，他有不願就此往生異國，希望再見故鄉妻子的念頭。在蔚山接到妻子來信時，更想念妻子。夢中多次出現兒子八郎，夢見母親亡故時他擔心母親。¹⁴² 真宗開山宗主親鸞有妻有子，真宗的寺即家。¹⁴³ 慶念亦有家眷，他掛念家族，對現世親情無法割捨。想到無法歸鄉，反而羨慕起雁子可以自由飛翔。他期待的是早日歸國，當軍隊撤退至蔚山時，他和兵士一樣倍感興奮，因更接近故鄉。蔚山籠城時，對他和多數士兵而言，切盼的是和談成功，但交涉卻決裂。激戰結束後，當天深夜接到太田一吉下達可以歸國的命令時，與伴僧了真兩人高興得流淚。離開蔚山後到達西生浦，由於傳聞可能留下半數軍隊，因此內心不安、苦悶，並怨起神佛。但經過一夜，隨即感到自己愚蠢，並且認命。當看到其他船隻已出航歸國，而自己搭乘的船隻仍未有動靜時，內心又開始不安。雖對妻子、母親思念至極，但亦無能如何，每天僅能以唸佛及詠歌安慰自己。在真正確定可以歸國時，心情才穩定，高興無比。¹⁴⁴

慶念雖記載日軍燒殺、掠奪，但由鎮川南撤至蔚山期間之戰鬥與日軍殘虐行為，幾乎未觸及。¹⁴⁵ 他多半敘述自己的心情、感懷，間接批判戰爭的殘忍性。不隱瞞對親人的思念，早日歸國的願望，及客死異鄉的恐懼，率直、赤裸的表達內心的感受。他是虔誠的真宗信徒，禮拜唸佛是生活重心。絕望時，寄望阿彌陀佛的救助。藉由報謝法會，求往生淨土。確知歸國日程時，感謝阿彌陀佛神奇不可思議的力量，及顯如上人的教化。完全是真宗專修唸佛，著眼現世的思維。他反覆嘆息戰場的悲慘，對現實無能為力，自始就無意參與這場戰爭。大桑齊認為，石山戰爭對真宗信徒而言是一場護法戰爭，但戰敗失去護法價值時，就可能產生厭戰。慶念的厭戰，需由此視角作捕

141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第 6 章〈僧慶念「朝鮮日々記」〉，解說，頁 651。

142 慶念，《朝鮮日々記》，7 月 26 日條，頁 67；10 月 9 日條，頁 87；11 月 2 日條，頁 95；12 月 20 日條，頁 126。

143 櫻部建講述，《真宗としての仏教》（東京：平樂寺書店，2002），頁 27-30。

144 慶念，《朝鮮日々記》，11 月 4 日條，頁 95-96；10 月 8 日條，頁 86-87；正月（1598）3 日、5-9 日、12-15 日、17 日條，頁 133-141。

145 同上註，9 月 14 日-10 月 8 日條，頁 79-87。

捉。¹⁴⁶

面高連長坊僅記載戰爭再起後島津軍的動態。1597 年 9 月島津義弘（1535-1619）與蜂須賀家政、生駒一正（1555-1610）、小西行長、毛利吉成（1567-1643）、鍋島直茂、池田秀雄（?-1597）、中川秀成（1570-1612）、熊谷直盛（?-1600）、垣見一直（?-1600）、早川長政、吉川廣家、長曾我部盛親（1575-1615）等十三人共同連署，在全羅道海南、康津，及慶尙道昆陽、丹城，發布如下榜文：「逃離之百姓還鄉，專心農耕。若不還鄉，則與南原周邊等郡一樣，放火焚蕩。上官悉殺戮，其妻子從人等全誅死，住宅放火燒毀。百姓若密告上官隱匿處，則給予褒獎。」¹⁴⁷ 日記中記載有逃入山中的朝鮮人返鄉、朝鮮人密告上官隱匿處、逮捕上官等即與此有關。¹⁴⁸ 日記亦記載南原之戰擄獲數千朝鮮人、殺朝鮮人、割朝鮮人之鼻、燒城等。¹⁴⁹ 割鼻多寡被視為是戰功，南原之戰島津軍取敵首 400 餘，泗川之戰取首級 38717 並割其鼻，但日記中割鼻僅 250 與 61 兩個數字。¹⁵⁰ 由日記起迄時間，知面高連長坊只記錄部分戰況。就其內容，僅行軍次第較明確。對佔領區之安民，敘述簡略。其對這場戰爭，無個人感懷，亦無批判。

隨軍僧侶有交涉、文書、醫療、戰鬥等任務性工作，無戰鬥時，以天荊、是琢明琳、宿蘆俊岳之日記觀之，仍是寄情詩賦，文人思維。天荊未隨小西行長至平壤，他在漢城作詩寄仙巢老人（景轍玄蘇）、大川和尚、謝增田長盛（1545-1615）贈衣，與大川和尚和詩，作詩書廳之壁，醉酒亦題詩。與友人及朝鮮人往來頻繁，如五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總計三十四次有相識者攜

146 大桑齊，〈善知識と「あさまし」の思想〉，頁 249-250。

147 《島津家文書》第 2 冊，《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 16 卷，971 號〈全羅道海南定榜文之事〉，頁 254-256；972 號〈慶尙道昆陽定榜文之事〉，頁 256-258；973 號〈慶尙道丹城定榜文之事〉，頁 258-260。

148 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9 月 25 日、27 日、28 日、30 日條，頁 641-642；10 月 2 日、3 日條，頁 642-643。

149 同上註，8 月 15 日、25 日條，頁 633、634；9 月 4 日、7 日、8 日、11 日條，頁 636、637、638；10 月 2 日、3 日條，頁 642-643。

150 島津久通等編，《征韓錄》，卷 4〈南原之城陷事附全州城明退事〉，頁 245；卷 5〈慶長三年十月一日朝鮮国泗川表に於て討捕首注文〉，頁 296。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9 月 8 日、11 日條，頁 637、638。

酒、送酒給他，其中十四次為朝鮮酒商李孝仁所送。¹⁵¹此外，他下圍碁或寫家書。¹⁵²

是琢明琳因病未隨軍赴晉州，留居竹島時因思故國江山，以故鄉十景賦詩十首。¹⁵³他住矮屋中，生活艱困。與天荊在漢城之生活相較，差距甚大。其日記載：

曲瘦臂于其中，點無樂也。立則梁簷礙帽上，故跣而以厭其卑。步則蘆床限韃底，故躋而以扶其危。真我與我對而以似正禮折腰也。且又欲出無衣，欲伴無僕，欲鋪無席，欲鑪無炭。炊無玉梁，汁無東坡。欲酌無酒，欲喫無茶。重無溫衾，寢無少年，嗚呼悲哉。¹⁵⁴

宿蘆俊岳之日記是以七言詩或五言詩及序文方式撰寫，行軍次第、途中景色、睹物感懷、送友歸期，均以詩文記述，計七十三首。¹⁵⁵日軍自漢城撤退至半島南海岸前，吉川廣家之軍隊已回釜山。之後進行和談，因此俊岳在釜山近七個月僅作詩、和詩，與惟杏永哲應答詩而已。¹⁵⁶

五、結 論

出兵朝鮮的九州將領不少是教徒，尤其篤信基督教的小西行長所率領的第一軍，屬下重要將領幾乎全是教徒。這些將領的領地也是教徒眾多的地區，因此其軍隊中有入教士兵。日軍撤退至半島南海岸後，日、明雙方持續和談。由於長時間作戰，歸國無期，士氣低落。駐守熊川的小西行長或許為鼓舞士氣，他向 Gomez 請求派遣傳教士至其軍中，因此 Cespedes 與 Leon 同赴熊川。Cespedes 在熊川及黑田孝高父子駐守的機張，為軍中信徒講道、聽告解，安慰他們的心靈。也為新入教者洗禮，提供醫療服務等，但停留時間很短。日

151 天荊，《西征日記》，5月9日、23日、24日條，頁679上、681上、下；6月1日條，頁681下；頁681上-685上。

152 同上註，6月26日、8月10日條，頁683下、685上。

153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頁357-360。

154 同上註，頁356。

155 宿蘆俊岳，《宿蘆稿》，頁999上-1010下。

156 同上註，頁1006下-1009上。

軍第二次入侵朝鮮時，亦有神父與修士短暫至半島。由於害怕異教徒告發，且朝鮮居民風聞日軍接近隨即遠走北方或逃入森林、山谷。因此，這些傳教士活動的地區既受限制，亦難與當地朝鮮人接觸，但他們對軍中教徒的情緒有穩定作用。

日軍侵略朝鮮期間，隨軍僧侶有禪僧、日蓮僧、眞宗僧、修驗僧等。他們與大明、朝鮮交涉和談、起草榜文、施藥醫療、從事戰鬥、弘法等。由於交涉和談均由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主導，此兩軍軍中之僧侶因此成爲雙方溝通的橋樑，溝通方法則是以筆札問答與轉譯方式進行。

奈良時代的官僧必須學習五明，醫方明是其中之一。此外地方僧侶因將救濟貧、病者當作是修業，亦習醫。醫術爲僧侶的學問之一，亦是一種教養。室町時代，禪僧在醫學上之任務雖不如前代重要，但並非完全遠離。¹⁵⁷ 又，眞宗僧若不關懷病患，在地方不易得到尊敬與信任，因此他們也從事醫藥。¹⁵⁸ 豐臣秀吉曾派遣二十名醫生分至各軍，¹⁵⁹ 但面對衆多傷兵及生病將士，醫生之不足可以想像。史料記載不多，但一般之隨軍僧侶有如慶念亦從事醫療，應可推測。

隨軍僧侶在軍中之宗教活動記載甚少，但由泗川之戰時，出現戰場之狐死城外，島津義弘令大日寺、大慈寺弔祭瘞埋之，¹⁶⁰ 及天荊在軍中舉行盂蘭盆會、弔祭亡故之兵士之母及朝鮮人等推測，¹⁶¹ 爲戰死者祈冥福、處理死亡者、弔祭等，應亦是其職責。

隨軍禪僧熟悉儒教，草擬之榜文即呈現儒家安民、恤民之統治理念。他們頌揚神功皇后征三韓，將兵端之起歸咎朝鮮。至於眞宗僧，信仰熱忱、堅

157 山田重正，《典医の歴史》（京都：思文閣，1980），頁 21、22、156。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卷 1，明應 8 年（1499）4 月 10 日、5 月 9 日、5 月 22 日條，天文 5 年（1536）9 月 3 日、閏 10 月 13 日條，頁 87 下、100 上下、104 上、244 上、255 上下；第 2 卷，天文 9 年 3 月 17 日、13 年 3 月 13 日條，頁 78 下、175 下。醫方明包括醫學、藥物、看護等。

158 井上銳夫，〈一向一揆——眞宗と民衆〉，收入笠原一男、井上銳夫校注，《蓮如・一向一揆》（東京：岩波書店，1972），頁 628。

159 《毛利家文書》第 3 冊，928 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 194 下。

160 《島津家高麗軍秘錄》，頁 367 下、370 上。

161 天荊，《西征日記》，6 月 16 日、21 日條，頁 683 上；7 月 15 日條，頁 684 上。

定，但著重現世利益。這些隨軍僧侶，無戰鬥時，多寄情詩賦，文人思維。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日)〈十一代上人御書〉，神奈川県企画調査部県史編輯室編，《神奈川県史》資料編 3 上，横浜：神奈川県企画調査部，1975。
- (日)《蓮茎一糸》，福岡：九州大學中央図書館收藏木活字版。
- (日)《泰長院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日)釋道契，《續日本高僧傳》，收入仏書刊行会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04 卷，東京：大法輪閣，2007。
- (日)《毛利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 8 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 (日)《吉川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 9 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 (日)《島津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 16 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 (日)《島津家高麗軍秘錄》，收入(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20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日)多聞院英俊，《多聞院日記》，收入(日)竹内理三編，《增補續史料大成》第 41 卷，京都：臨川書店，2002。
- (日)天荊，《西征日記》，收入国書刊行会編，《続々群書類從》第 3 冊，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会，1970。
- (日)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秀吉の朝鮮侵略とその歴史的告発》，東京：株式會社そしえて，1982。
- (日)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收入佐賀県史編纂委員會編，《佐賀県史料集成》，〈古文書編〉第 5 卷，佐賀：佐賀県立圖書館，1960。
- (日)宿蘆俊岳，《宿蘆稿》，收入(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13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9。
- (日)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收入(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5 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
- (日)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会編，《続々群書類從》第 4 冊，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会，1970。

- (日) 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收入(日) 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20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日) 慶念著，《朝鮮日々記》，《朝鮮學報》第 35 輯(1965.5): 55-148。
- (日) 慶念，《朝鮮日々記》，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京都：法藏館，2000。
- (日) 古橋左衛門又玄，《清正記》，收入(日) 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15 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28。
- (日) 大河内秀元，《朝鮮記》，收入(日) 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 20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朝鮮) 趙慶男，《亂中雜錄》，漢城：趙台熙，1964。
- (日) 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中冊，明曆四年(1658)刊本。
- (日) 島津久通等編，《征韓錄》，收入(日) 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
- (日) 山鹿素行，《武家事紀》，收入《山鹿素行先生全集》，東京：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會，1916。
- (朝鮮) 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第 8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2。
- (日)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
- (日) 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太洋社，1934、1935。
- (日)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1961。
- (日)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
- (日) 萩原龍夫校注，《八幡愚童記》乙，收入(日) 櫻井德太郎、萩原龍夫、宮田登編，《日本思想大系 20：寺社緣起》，東京：岩波書店，1975。
- (葡) ルイス・フロイス(Luís Fróis) 著，(日)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フロイス日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 (日) 松田毅一監譯，《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 1 期第 2 卷、第 3 卷，京都：同朋社，1987、1988。
- (日) 《旧記雜錄》後編 2，收入鹿兒島県維新史料編さん，《鹿兒島県史料》，東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1983。

二、近人論著

- (日) 大原誠 2004 〈「端坊由緒書」について〉，《佛教史研究》40(2004.3): 107-118。
- (日) 大桑齊 2000 〈善知識と「あさまし」の思想〉，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

- 《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京都：法藏館，頁 247-269。
- (日) 大隅和雄、(日) 中尾堯編 1998 《日本仏教史》中世，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大関定祐 1917 《朝鮮征伐記》，東京：國史研究會。
- (日) 山口正之 1938 〈文祿役中朝鮮陣より発せし耶蘇會士セスペデスの書翰につきて〉，《史学雑誌》49.2(1938.2): 159-191。
- (日) 山口正之 1930 〈日本耶蘇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青丘学叢》2 (1930.11): 57-68。
- (日) 山口正之 1931 〈耶蘇會宣教師の入鮮計画〉，《青丘学叢》3(1931.2): 137-140。
- (日) 山口正之 1967 《朝鮮西教史》，東京：雄山閣。
- (日) 山本秀煌 1925 《日本基督教史》上卷，東京：新生堂。
- (日) 山田重正 1980 《典医の歴史》，京都：思文閣。
- (日) 中村栄孝 1965 〈「右武衛殿」の朝鮮遣使〉，收入氏著，《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卷，東京：吉川弘文館，頁 749-770。
- (日) 中野等 2006 《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井上鋭夫 1972 〈一向一揆——真宗と民衆〉，收入(日) 笠原一男、井上鋭夫校注，《蓮如・一向一揆》，東京：岩波書店，頁 615-640。
- (日) 五野井隆史 2002 《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五野井隆史 2005 《日本キリスト教史》，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内藤雋輔 1965 〈僧慶念の「朝鮮日々記」について〉，《朝鮮學報》35(1965.5): 155-167。
- (日) 内藤雋輔 1976 《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日) 木村紀八郎 2005 《小西行長伝》，東京：鳥影社。
- (日) 北島万次 1990 《豊臣政権の対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
- (日) 北野典夫 1993 《天草キリシタン史》，福岡：葦書房。
- (日) 外山幹夫 1981 《大村純忠》，東京：静山社。
- (日) 平田厚志 2000 〈「うき世」から「ミヤこ」への旅路〉，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頁 270-290。
- (日) 立正大學日蓮教學研究所編 1984 《日蓮教団全史》，京都：平樂寺書店。
- (日) 辻善之助 1960 《日本仏教史》，東京：岩波書店。
- (日) 伊藤幸司 2002 《中世日本の外交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早島有毅 2000 〈慶念の生涯と文化的素養〉，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

- 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頁 141-160。
- (日) 池内宏 1987 《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竹本弘文 1995 《大友宗麟》，大分：大分県教育委員会。
- (日) 伴三千雄 1921 〈南鮮に於ける慶長文祿の築城〉5，《歴史地理》37.4(1921.4): 279-286。
- (日) 伴三千雄 1921 〈南鮮に於ける慶長文祿の築城〉6，《歴史地理》37.5(1921.5): 351-367。
- (日) 松田甲述 1976 〈僧玄蘇朝鮮の初旅〉，收入氏著，《續日鮮史話》，東京：原書房，頁 1-18。
- (日) 松田毅一 1953 《キリシタン研究》，大阪：創元社。
- (日) 河合正治 1961 《安國寺惠瓊》，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長正統 1963 〈景轍玄蘇について——一外交僧の出自と法系〉，《朝鮮學報》29(1963.10): 135-147。
- (日) 冠賢一 1997 〈近世初頭日蓮宗とキリスト教の関連——肥後国における加藤清正の宗教政策〉，《日本佛教學會年報》62(1997.5): 249-261。
- (日) 柳田利夫 1982 〈文祿、慶長の役とキリシタン宣教師〉，《史學》52(1982.6): 19-39。
- (日) 島津亮二 2010 《小西行長——「抹殺」されたキリシタン大名の実像》，東京：八木書店。
- (日) 草野顯之 2000 〈本願寺教団の朝鮮進出——関連史料を読む〉，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頁 351-382。
- (日) 高田徹 2002 〈熊川倭城の縄張り〉，《倭城の研究》5(2002.3): 81-100。
- (日) 參謀本部編 1978 《日本戦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
- (日) 貫井正之 2001 〈壬辰丁酉倭乱および戦後の日朝交渉における惟政（松雲大師）の活動に関する考察〉，《朝鮮學報》178(2001.1): 97-139。
- (日) 楠田斧三郎 1996 《朝鮮天主教小史》，東京：大空社。
- (日) 藤木久志 1975 《織田・豊臣政権》，東京：小學館。
- (日) 櫻部建講述 2002 《真宗としての仏教》，東京：平楽寺書店。
- 羅麗馨 2007 〈日本人的朝鮮觀——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新史學》18.3(2007.9): 181-211。
- (西) ディエゴ・パチェコ (Diego Pacheco, SJ) 1977 《九州キリシタン史研究》，東京：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会。
- (西)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 (Ruiz de Medina) 1988 《遙かなる高麗——16 世紀

韓国開教と日本イエス会》，東京：近藤出版社。

(盧) 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ェン (Michael Steichen) 著，(日) 吉田小五郎譯 1952
《キリシタン大名》，東京：乾元社。

Toyotomi Hideyoshi's Invasions of Korea: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Buddhist Monks in the Japanese Army

Lo Lee-hsin*

Abstract

Toyotomi Hideyoshi 豐臣秀吉 launched invasions of Korea in 1592 and 1597. A number of generals were Christians whose territories also contained numerous Christians, and many of whose troops were Christian. After withdrawing to the south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 continued peace talks with the Ming court. With no date for returning home in sight, morale among the troops was low. Being a devout believer, General Konishi Yukinaga 小西行長 turned for help to Pedro Gomez, vice-provincial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Japan, requesting that a missionary be sent among the troops to boost morale. Gomez dispatched fellow Spanish missionary Gregorio Cespedes accompanied by a Japanese Jesuit brother Leon Fancan to the camp to preach, hear confessions, give pastoral care, carry out baptisms, and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to troops. However, their stay was short. During the second invasion of Korea,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brothers were again sent to the peninsula for a short period, but feared accusations from followers of other faiths, and when Koreans living nearby got wind of the presence of the Japanese troops nearby, they fled. The area of missionary activity was therefore limited and contact with the local Koreans difficult.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accompanying the troops were

* Lo Lee-hsi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Zen 禪, Nichiren 日蓮, and Shinshuu 真宗 monks. They communicated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ing and Korean courts, drafted announcements, provided medical services, participated in battles, and propagated Buddhist teachings. As the peace negotiations were led by Konishi Yukinaga and Katou Kiyomasa 加藤清正, the monks in their two armies became a bridge for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few records of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among the troops, but amo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as praying for the war dead.

The Zen monks accompanying the troops knew much about Confucianism. The public notices they drafted incorporated ideas of Confucian government such as reassuring and showing concern for the people. They also praised Empress Consort Jingu's 神功 attack on Korea in the Samhan 三韓 period, blaming Korea for starting hostilities. Shinshuu monks were enthusiastic, firm believers, but stressed the interests of the present world. During breaks in the fighting, monks expressed their emotions in poetry and literary musings.

Keywords: Toyotomi Hideyoshi 豐臣秀吉, Christian missionary, Buddhist monk, Konishi Yukinaga 小西行長, Katou Kiyomasa 加藤清正,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1592-1598)